

壹、緒論

人們經常談論教育，但也常忘了教育是這個社會體系的一部分。教育體系不是建立在真空世界的體系，是伴隨著國家官僚體系所建立起來，因而是國家官僚體系的一部分（Bauman, 1987）。在現代性的發展初期，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的制度，本質上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而教育在社會秩序的維繫中，又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不過，相對的，國家在早期現代性的發展中，也擁有較大的權力。這裡所謂的權力，特別指的是在「論述創造」和「社會資源配置」上。不過，和當代新自由主義或經濟全球化的今日社會相較之下，顯然國家的權力正在流失當中。舉例而言，在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中，國家常被視為是無效率的代名詞，為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國家必須擁抱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把市場化、效率、競爭等概念，視為是國家發展的重要策略原則。這種原則，不僅被運用在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政策思考，同時也對教育產生實質的影響。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機構，更被視為是服務於經濟發展的下層機構，當代幾乎所有的國家莫不視發展經濟競爭力為國務的前題。在經濟政策上，這代表著要不斷的替企業們去管制化，也就是不斷的為企業減稅、提高企業的流動自主性、降低各種成本、創造更有彈性的工時等，其原因在於企業是可以全球流動的，而國家權力則被限制在領土裡。因而為了讓企業能留在本土，創造更多就業和消費能力，國家莫不使盡全力挽留企業。換言之，國家的權力在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下，是不斷在流失的，過去國家對企業那種有計劃和可掌控的年代，在今日的世界已不可行。

由於教育是國家官僚體系中的一環，在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環境下，自然也開始產生轉變。過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已有學者提出，這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教育課程正出現一種「世界課程」的樣貌，也就是世界各國課程的同質性正愈來愈接近。近來更發現，世界課程更是發展出一種以「自然科學」為主的傾向（Drori, Meyer, Ramirez & Schofer, 2003）。其背後的原因，

正因自然科學和競爭力的提升之間被視為具有相當正比的關係。也就是說，當代教育對自然科學的重視，反映的不僅是國家的需求，更是新自由主義論述下的結果。當然，這些問題還包括新形式國家教育政策治理方式的出現及國際大型測驗的排名結果。不過，倒是可以得到一個小小的結論，那就是目前的教育正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環境和國家體系的運作下，把教育化約為一種提升競爭力的工具。詳細的討論，我們會在後面提到。

於是，幾個相關的問題便相繼而來。第一、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發展下，教育如何受新自由主義論述和國家政策的控制？第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發展會不會帶來什麼預期之外的後果呢？第三、如果新自由主義有問題，教育卻又同時受限於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論述和國家機械中，那麼，教育又如何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以朝向一個更令人期待的未來社會呢？本文的段落便是主要在回應這些問題。

貳、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教育政策

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共識，主要可說是源自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華盛頓共識」是由美國發起並主導，當時邀請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國際組織針對拉丁美洲國家轉型所制訂的一套策略方針（Batra, 2005; Giroux, 2005）。而這套策略，正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之上，並透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對外的協助政策，把這樣的意識型態帶到許多各國。當然，除此之外，1980年代的英、美政府（雷根政府和柴契爾政府），也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廣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Giroux, 2009; Hill & Kumar, 2009）。如Bauman（1999）指出，當時柴契爾政府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再也沒有像「社會」這樣一個東西了！這樣的政治思維基本上是符合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應小而美的看法：國家不應干預市場，要讓市場機制那隻看不見的手，以競爭的方式來產生最佳效率和績效；而雷根政府當時也以減稅、縮小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管制等主張，在美國推動新自